

克格勃绝密档案

克格勃绝密档案

(上册)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瓦西里·米特罗欣 著
王振西 主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第 7 章

曼哈顿计划和合金管计划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外国科的首要行动目标是英国，第二大目标才是美国。甚至到了 30 年代中期，苏联在美国的主要间谍网还都是由第四局（军事情报局，后来被改名为总情报部）而不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负责的。第四局的间谍中有一批在美国政府部门中工作的富于理想主义色彩、很有抱负的年轻人，其中包括：于 1936 年进入国务院工作的阿尔杰·希斯和朱利安·沃德利、在财政部工作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以及一位政府统计官员乔治·西尔弗曼（怀特可能就是被他招募为间谍的）。和剑桥“五杰”一样，华盛顿的这些人把自己视为与法西斯进行秘密斗争的战士。沃德利后来写道：

当共产国际成为世界上唯一一支抵抗纳粹的有
效力量的时候，在华盛顿，通过替苏联进行地下工作，
我也在为阻止法西斯主义的浪潮贡献着自己微薄的
力量。

30 年代中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美国的主要情报活动

克格勃绝密档案

都是由一个成立于 1934 年的秘密情报站进行的。该情报站由前柏林情报站站长波利斯·巴扎罗夫(代号诺德)指挥,由伊斯拉克·阿卜杜洛维奇·阿赫梅罗夫(代号扬)——一个出生在苏联的鞑靼人——任副站长。在巴扎罗夫情报站里工作的奥地利间谍赫德·马辛对巴扎罗夫抱有一份非常美好的记忆,认为巴扎罗夫是她在内务人民委员会里遇到的最热情的人。在 1935 年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巴扎罗夫送给她五十枝长茎红玫瑰,并在卡片上写道:

我们的生活处于非自然的状态,但是为了全人类,我们必须忍受这一切。虽然我们不会时常用言语来表达这份感情,但是我们是一个由彼此间的关爱团结在一起的集体。非常想念你。

尽管在马辛的印象里,阿赫梅罗夫与巴扎罗夫正好相反,是一个典型的“莫斯科机器人”,但实际上,阿赫梅罗夫并不像他表面上看来那样死板。马辛并不知道阿赫梅罗夫正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的表妹海伦·劳里热恋。中心还特许了他们的婚事。

巴扎罗夫和阿赫梅罗夫招募的间谍中有三个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他们是:埃里克·克伊和“19号”。其中唯一一个可以被明确确认身份的,同时也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是“19号”劳伦斯·达根,他后来担任了拉丁美洲司司长。在赫德·马辛看来,达根是个“高度紧张、容易兴奋同时又很有知识的年轻人”。招募他确实花费了一番功夫,这在相当程度是因为阿尔杰·希斯当时也在试图把他发展成第四局的间谍。1936年4月,巴扎罗夫向中心抱怨说“固执的希斯”仍然没有丝毫放弃发

克格勃绝密档案

展达根的迹象。一年后,在莫斯科公开审判期间,达根告诉阿赫梅罗夫,如果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他担心自己会被托洛茨基分子暴露。但是到1938年初,达根已经开始向阿赫梅罗夫提供国务院里的文件了。这些文件被送到秘密情报站拍照后,再交还给他。3月份,达根报告称,他的密友,1938年至1945年担任副国务卿的萨姆纳·韦尔斯对他说,他对马克思主义太着迷了,并就他与左派人士交往这件事对他提出了警告,尽管这种警告很可能是善意的。然而,达根在国务院里的前途似乎仍和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唐纳德·麦克莱恩一样非常光明。

中心也非常看好迈克尔·斯特雷特(代号诺马德、奈杰尔)这个年轻而富有的美国人。1937年,即将从剑桥大学毕业的斯特雷特被发展为苏联间谍。他的乐观主义精神主要来自于他的家庭关系,而不是他对充当秘密间谍的热情。回到美国后,他的第一次求职面试是在白宫与富兰克林和埃利诺·罗斯福在茶桌上进行的。在罗斯福夫人的帮助下,1938年初,他在国务院里找到了一份不计报酬的临时工作。不久后他就接到了阿赫梅罗夫的电话。阿赫梅罗夫向他转达了“剑桥的朋友对他的问候”,并邀请他到当地的一家餐厅共进晚餐。阿赫梅罗夫介绍自己叫“迈克尔·格林”,然后点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乘阿赫梅罗夫吃东西的时候斯特雷特观察着他:

他是个黑黑的、健壮的家伙,宽宽的嘴唇,嘴角上总挂着微笑。他的英语说得非常好,举止亲切自如。看来,他非常喜欢自己在美国的生活。

阿赫梅罗夫似乎接受了斯特雷特需要过些时间才能接触到重要文件这一现实,而且显然做好了等待的准备。买单前,他就

克格勃绝密档案

国际关系问题给斯特雷特上了简短的一课。斯特雷特被“侃晕了”。虽然斯特雷特声称自己“不愿意成为苏联安插在国务院里的间谍”，但他并没有对阿赫梅罗夫说明这一点。两个人像“朋友似的告了别”，斯特雷特同意继续他们之间的约会。

随着欧洲战事的临近，中心对美国越来越感兴趣。1938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以四局主要交通员惠特克·钱伯斯叛变这件事为借口，接管了四局负责的绝大部分在美国的军事间谍。但值得注意的是，阿尔杰·希斯并不在被接管之列。然而和在其他地区一样，追踪臆想出来的“人民公敌”这个任务干扰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美国的情报工作。1938年至1939年在纽约公开情报站工作的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莫罗佐夫（代号尤兹、基尔）为了表示自己对中心的忠诚，指控情报站站长彼得·达维多维奇·古特蔡特（代号尼古拉）和他的绝大多数同事是暗藏的托派分子。1938年，公开情报站站长古特蔡特和秘密情报站站长巴扎罗夫均被召回并被枪毙了。莫罗佐夫对新任站长盖伊克·巴达洛维奇·奥瓦基米扬（代号根纳季）的指控却没有那么成功，反而可能还导致了他自己于1939年被召回了莫斯科。

巴扎罗夫的前任副手伊斯哈克·阿赫梅罗夫接替巴扎罗夫担任了秘密情报站站长，此后就一直由他控制着在美国的大部分政治情报工作。在二战前夕，中心对八名间谍寄予了特别的厚望，米特罗欣记录了他们的代号。这八名间谍是：在国务院工作的劳伦斯·达根（代号19号，后来的代号为弗兰克），迈克尔·斯特雷特（代号奈杰尔），美国驻德国前任大使威廉·多德的女儿、百万富翁阿尔弗雷德·考夫曼·斯特恩（他本人也是个苏联间谍）的妻子马莎·多德·斯特恩（代号莉莎），马莎的弟弟，曾以民主党人身份竞选国会议员没有获得成功却仍然保持着政治上的野心的小威廉·多德（代号总统），在财政部工作的哈里·

克格勃绝密档案

德克斯特·怀特(代号卡西尔,后为尤里斯特),潜伏在司法部的代号为莫里斯的间谍(可能是约翰·阿伯特),好莱坞制片人,曾经生产过由劳雷尔和哈蒂主演的“飞行魔王”及其他一些创票房纪录的影片的鲍里斯·莫罗斯(代号弗罗斯特),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利普曼的秘书、秘密共产党员玛莉·沃尔夫·普赖斯(代号基德和迪尔),以及巴尔的摩的一家女性时装沙龙的老板亨利·布克曼(代号雇主)。

然而,1939年8月,随着苏德条约的签定和发生在英国的情况一样,苏联在美国的政治情报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劳伦斯·达根为了表示抗议,中断了与阿赫梅罗夫的联系。迈克尔·斯特雷特等人也对苏联产生了严重的怀疑。10月份,在华盛顿联邦火车站下面的一家餐厅见面时,阿赫梅罗夫试图向斯特雷特保证:“伟大的日子就要来到了!”阿赫梅罗夫还声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革命将在德国和法国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但是,斯特雷特并没有被这些言语所打动,也没有在下次约会的时间里露面。除了上述两个人外,还有一些人至少是暂时地中断了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联系。

与斯特雷特见面后不久,阿赫梅罗夫被召回了莫斯科。他的离任进一步削弱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美国的工作。在莫斯科,贝利亚指控阿赫梅罗夫与“人民公敌”进行阴谋交易。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个指控被搁置下来。阿赫梅罗夫被调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预备队,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仍然受到怀疑,他的一言一行受到了全面的审查。在阿赫梅罗夫被召回后,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美国的工作中心第一次转移到设立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内的公开情报站。该情报站由后来联邦调查局称之为“老谋深算的美国人”的盖伊克·奥瓦基米扬领导。奥瓦基米扬发现自己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中心还指望他积极参与在墨西哥刺杀托洛

克格勃绝密档案

茨基的复杂的准备工作,他更是累得苦不堪言。有时奥瓦基米扬一天要约见十个间谍,回到家的时候,他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奥瓦基米扬的最大成就并不是在政治情报而是在科技情报搜集工作上取得的。奥瓦基米扬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获得了理科博士学位,而且从 1933年起,他是以美苏商贸公司工程师的掩护身份从事情报活动的,这在外国科里是比较少见的。

1940年,为了寻找间谍发展对象,他上了纽约的一所化学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奥瓦基米扬是第一个展示了在美国收集科技情报的巨大潜力的间谍。仅 1939年一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就从美国获得 18000页技术资料、487套设计方案和 54种新技术的样品。

奥瓦基米扬可能也是建议以互换学生为掩护,使外国科官员打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人。1938年,第一个“互换学生”谢苗·马尔科维奇(代号特文)迈进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大门。他在以后的两年中在科技界建立起来的联系,为战争时期拓展在美国的科技情报搜集工作奠定了基础。1940年,他的掩护身份转为美苏商贸公司的工程师。“在与人交谈时,他的大眼睛就像抛物面天线一样不停地转来转去”,这一点给他在纽约情报站的一位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1年4月,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美国的情报网已经发展到拥有 221名间谍的规模,其中 49名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统计数据中被称为“工程师”(这一概念很可能指的是范围更宽泛的“科学家”)。同一个月,中心第一次在其主要的情报站里建立了专门处理科技情报的独立部门(后来被称为 X线),这也显示出科技情报工作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根据国外情报局的官方历史记载,正是由于与过多的间谍接触使奥瓦基米扬“放松了警惕”。1941年5月,正在从代号为

克格勃绝密档案

奥克塔尼的间谍手上接过文件时,他被联邦调查局当场抓获。在关押了不长一段时间后,他被保释,并在7月份被允许离开美国。如果不是罗斯福政府的安全体制相当松懈的话,那么对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情报活动的打击会远远不止于奥瓦基米扬被捕这一件事。1939年9月2日,战争在欧洲爆发的第二天,惠特克·钱伯斯把他所了解到的苏联在美国开展的间谍活动尽数向助理国务卿、罗斯福总统的国内安全事务顾问阿道夫·伯利作了汇报。之后,伯利立即为总统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列出了阿尔杰·希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和其他一些主要的苏联间谍(钱伯斯曾经为这些人充当过通信员)的名字。名单里还包括总统的一位主要助手,劳克林·柯里(伯利错把他的名字拼成了洛克伍德·柯里)。然而,罗斯福对此并不感兴趣。看来,他认为在他的政府里潜伏着苏联间谍的想法是荒谬的。同样让人不解的是,伯利竟然也把自己的报告束之高阁。他甚至都没有把报告交一份给联邦调查局,直到1943年,联邦调查局向他索要时,他才把这份报告交给他们。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德国对美国宣战之后,瓦西里·扎鲁宾(化名祖比林,代号马克西姆)被任命为纽约公开情报站站长。斯大林对英国打败德国的承诺早已持深深的怀疑态度,同时他对美国人的立场也不相信。在扎鲁宾启程赴任前,他召见了扎鲁宾,告诉他说他在美国的主要任务就是注意发现罗斯福和“美国领导层”与希特勒进行谈判和单独签署和平协议的动向。作为设立在苏联驻纽约领事馆的合法情报站站长,扎鲁宾同时还负责设在华盛顿、旧金山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下级情报站的工作。有证据表明(虽然这些证据不够完全),斯大林一直对直接监管针对苏联的盟国的情报工作非常感兴趣。

克格勃绝密档案

国外情报局一份简要的官方传记把战争时期扎鲁宾在纽约（后来在华盛顿）的工作描写成一个没有任何缺陷的、成功的典范。事实上，他那令人生厌的个性和出言不逊的行为当即引起了情报站里的骚动。扎鲁宾对自己带来的情报官员（包括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尤利耶夫娜·扎鲁宾娜）的偏爱，和对以前就在情报站里工作的其他官员毫不掩饰的蔑视，导致了一些情报官员的公开反抗。曾被侮辱过的两名情报官员，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米罗诺夫和瓦西里·格奥尔基耶维奇·杜鲁古夫开始不厌其烦地向中心报告称：“他粗鲁、缺乏风度、满口市井、言辞龌龊，工作上粗心大意，成天鬼鬼祟祟”，并要求把他和一样不受欢迎的他的妻子召回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情报站里的内部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扎鲁宾发展间谍的策略简单而且直截了当。他要求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推荐在美国政府部门里工作的、适合于从事间谍活动的共产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扎鲁宾到达纽约的时候，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代号舵手），因为频繁出入苏联时使用假护照，还处在服刑期间。因此，扎鲁宾见到的第一个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尤金·丹尼斯（出生时的名字是弗朗西斯·沃尔德伦，代号瑞安）。此人是在莫斯科接受过训练的共产国际间谍，后来他接替白劳德成为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丹尼斯汇报说，一些共产党员（主要是些秘密党员）正在设法进入美国第一个职业对外情报部门——情报协调官办公室。1942年6月这个机构改组为战略情报局。在战略情报局成立以前不久，白劳德出狱并重新担负起美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丹尼斯向莫斯科汇报说：“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邓肯·查普林·李（代号科克）是第一批打入战略情报局的苏联间谍之一，并成为情报局局长“疯狂比尔”多诺万将军的助

手。多诺万对吸收共产党员进入战略情报局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曾说：“如果我认为这样做能够帮助我们战胜希特勒的话，我会把斯大林也吸收进战略情报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战略情报局的了解，远比战略情报局对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了解要多得多。

白劳德的间谍发展对象还包括一些外国共产党员和到美国寻求避难的人，其中最重要的要数法国激进派政治家皮埃尔·科特了。此人在战前为时不长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曾六次担任航空部部长，两次出任商业部部长。他可能在30年代就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发展成了间谍，但是在苏联对其驻外情报人员进行清洗后的那段混乱的日子里与中心失去了联系。另外，他也谴责苏德条约的签定。遭到1940年法国沦陷后“自由法国”运动领导人查尔斯·戴高乐将军的冷落后，科特来美国生活了几年。11月份，白劳德向莫斯科报告说：“科特希望苏联领导人能了解，他愿意执行我们赋予他的任何任务，并准备为此放弃他以前的立场。”可能就在科特到达纽约一个月之后，扎鲁宾开始和他接触，并以他那一贯的无礼作风，敦促科特为苏联卖力地从事间谍活动。克格勃为科特建立的档案显示，扎鲁宾下达命令时的专横态度使他大吃一惊，并坚持说对他的命令必须得到一位流亡在苏联的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批准。7月1日，扎鲁宾向中心报告说：“特工皮埃尔·科特已正式启用了”，其代号为戴达鲁斯。1944年，科特被派到莫斯科代表戴高乐临时政府执行一个为期三个月的任务。他在这次任务的总结报告中称：“自由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逐渐被剥夺，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却不断地丰富起来。”

虽然中心对白劳德发展的间谍的质量还算留下了一些印象，但是，它提醒扎鲁宾不要过分依赖这些人：

克格勃绝密档案

我们同意利用共产党(党员)特工的情报收集能力……作为情报站工作的补充力量,但是,把这一力量当做工作支柱的做法是错误的。

几乎就在 1941 年 12 月扎鲁宾到纽约担任公开情报站站长的同一个时候,伊斯哈克·阿赫梅罗夫(后来使用过代号“扬”和“阿尔伯特”)也回到了纽约,重建两年前被中心命令放弃的秘密情报站。虽然他以前曾经使用过土耳其和加拿大的身份证,但这一次,他使用的是 1938 年获得的伪造的美国护照。虽然阿赫梅罗夫的妻子兼助手海伦·劳拉(代号马德伦·埃达)是白劳德的侄女,但是他并没有像扎鲁宾那样与白劳德联系。1942 年 3 月,阿赫梅罗夫夫妇从纽约搬到了巴尔的摩(在这里更容易指挥在华盛顿的苏联间谍)。阿赫梅罗夫的继父曾经当过毛皮商,因此阿赫梅罗夫与另一个代号为霍夏辛的苏联间谍合伙在巴尔的摩开了一家毛皮衣商店,作为掩护职业。

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被阿赫梅罗夫寄予很高希望的迈克尔·斯特雷特拒绝重新为苏联充当间谍。1942 年初,他与阿赫梅罗夫在华盛顿见了最后一面,拒绝以后再和他接触,然后与阿赫梅罗夫握手道别。其他绝大多数战前的间谍都被阿赫梅罗夫说服,重新开始了工作,其中包括劳伦斯·达根(弗兰克)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尤里斯特)。在罗斯福的第三个任期里(1941 年至 1945 年)担任副总统的亨利·华莱士后来曾说,如果身体状况欠佳的罗斯福死在第三个任期内,由他接任总统的话,他准备让达根担任国务卿,让怀特出任财政部长。然而,罗斯福却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连续担任四任总统的人,他在第四个任期内干了三个月,并在 1945 年 1 月让哈里·杜鲁门接替华莱士担任了副总统。苏联情报机构在打入主要西方国家政府

克格勃绝密档案

部门方面获得最辉煌的成就的机会就此失去了。不过，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向罗斯福政府所有最敏感部门进行渗透方面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在阿赫梅罗夫在华盛顿的间谍网中，内森·戈里高利·西尔弗马斯特(先后使用过帕尔和普尔伯特两个代号)所领导的间谍组所获取的情报是最多的。该小组由一群共产党员和在政府机构担任公职的同路人构成。西尔弗马斯特在农业安全管理局做统计员，后来临时调到经济战委员会。“戈里克”西尔弗马斯特始终保持着一一种执着的革命理想。他患有慢性支气管哮喘，经常喘不过气来，但是他认为：“我的生命是非常有限的，当我死去时，我希望能够感觉到至少自己曾经在为后代创造美好生活的事业中贡献过一份力量。”

阿赫梅罗夫认为，虽然西尔弗马斯特所采取的非正统的方法带有一定的冒险性，但是，因为他手下的信息来源很多，他可以收集非常多的情报，比一个苏联指导员只管辖一个间谍的情况下要多得多。这个想法很可能是正确的。西尔弗马斯特看不起内务人民委员会那套官僚式的“正统方法”。虽然他手下的每个间谍都很清楚自己提供的情报最终会送到哪里去，但是整个间谍网都是在阿赫梅罗夫所谓的“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运转的。西尔弗马斯特的间谍认为他们是在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美国共产党在帮助它的苏联同志。

为了减少安全风险，阿赫梅罗夫在自己与西尔弗马斯特的情报小组中间设置了两道保险开关。第一道开关是一位名叫伊莉莎白·本特利(代号米尔娜，后来又使用了一个更谦逊的名字“好女孩”)的通信员。本特利毕业于瓦瑟大学。1938年，三十岁的本特利被说服断绝了与美国共产党的公开联系，以便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每隔两周，本特利都会去取被西尔弗马斯特

克格勃绝密档案

夫妇制作成微型胶卷的机密文件，放在她的编织袋里带回。她并不直接向阿赫梅罗夫本人报告，而是向阿赫梅罗夫情报站里的另一名特工雅各布·戈洛斯（代号“声音”）报告。她叫他“蒂米”。在纽约的一场暴风雪中，戈洛斯违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纪律，诱奸了本特利。在本特利对这件事充满激情的回忆中，她这样描述道：她感觉自己“好像飘飘忽忽地进入了一个无始无终的极乐世界”。在戈洛斯这个缺乏职业道德的影响下，本特利开始把感情与间谍活动掺杂起来，而中心对这种做法是非常担心的。每个圣诞节，她都会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基金给西尔弗马斯特小组的成员购买一些她精心挑选的礼物，从威士忌酒到女式内衣，什么都有。她后来说：“这是过去的美好时光，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是亲密的战友，在一起共同战斗。”

和扎鲁宾的情报站一样，阿赫梅罗夫秘密情报站招募的间谍既有美国人也有其他外国人。其中最重要的间谍之一，是一位英国记者兼战时情报官锡德里克·贝尔弗雷奇（代号查理）。此人于美国参战后不久，加入了设立在纽约的英国安全协调办公室。该机构受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威廉·斯蒂芬森爵士直接领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时间里，这个机构负责英国安全局、特别行动执行小组和秘密情报局与美国之间的情报联络工作。贝尔弗雷奇是自愿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和许多在美国为苏联充当间谍的美国人一样，他首先接触的是厄尔·白劳德，然后被移交给了戈洛斯。由于战争期间英美情报机构交换的秘密情报数量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贝尔弗雷奇接触到的情报也异常丰富。

阿赫梅罗夫的秘密情报站通过设在纽约领事馆的公开情报站转交给中心的微型胶卷的数量在一年中翻了三番，从1942年的59卷增加到了1943年的211卷。尽管如此，扎鲁宾认为阿赫

克格勃绝密档案

梅罗夫拒绝与美国共产党领导层进行直接联系和迂回操纵西尔弗马斯特小组的办法是低效和繁琐的。扎鲁宾则抱怨说阿赫梅罗夫的作风“呆板且让人不信任”，就阿赫梅罗夫与扎鲁宾的关系而言，这个评价可以说是真实的。扎鲁宾对阿赫梅罗夫的妻子海伦·劳拉的评价却要高得多。他认为她更机敏，更会办事。由于从小受美国教育长大，所以她能与为苏联充当间谍的美国人更好地沟通。

这样，斯大林了解到的关于美国的情报远比罗斯福掌握的有关苏联的情报要多得多。当中心已经渗透到罗斯福政府的每一个重要部门的时候，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一样，还没有在莫斯科安插一个间谍。1943年11月，三巨头在德黑兰举行会议的时候——这也是斯大林和罗斯福第一次见面——斯大林在情报上的巨大优势使他在谈判中占尽了先机。虽然人们至今还不了解在会议前，斯大林到底得到了哪些情报，但是可以肯定，他掌握的情况是非常充分的。他一定已经了解到罗斯福到德黑兰来的时候已经决心尽最大可能与他达成协议，甚至不惜以惹怒丘吉尔为代价。罗斯福一到德黑兰即将他的意图暴露无遗。他拒绝了丘吉尔提出的在会议开始前英美举行私下会晤的建议，但却接受了斯大林诚恳的建议（据称是以安全为由）：希望他住在苏联大使馆而不要住在美国代表团的驻地。看起来，罗斯福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住处受到了苏联人的窃听（这是不可避免的），他自己以及美国代表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录了音，抄录下来，并定期汇报给斯大林。

斯大林肯定也非常高兴地看到，罗斯福带来了他战争时期最亲密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却被留在了国内。霍普金斯非常信任俄国人，这在莫斯科是出了名

克格勃绝密档案

的。年初 ,霍普金斯曾私下警告苏联驻美大使 ,联邦调查局窃听到了扎鲁宾 (霍普金斯显然只是把他当成了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 向美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重要成员史蒂夫·纳尔逊移交经费的情况。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提供的罗斯福与丘吉尔 1943 年 5 月会晤的谈话内容很可能也是来自霍普金斯。然而 ,也有一些关于似乎很确凿但很有争议的证据表明 ,除了向苏联大使传递秘密情报之外 ,霍普金斯有时也会利用阿赫梅罗夫这个渠道刺探苏联方面的情报 ,就像后来肯尼迪家族利用总情报部的间谍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一样。霍普金斯提供的秘密信息给中心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此多年以后 ,一些克格勃的官员甚至吹嘘说霍普金斯就是一名苏联间谍。但这与事实完全不相符。霍普金斯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爱国者 ,他对苏联的体制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苏联在二战中的功绩令他深有感触 ,并使他形成了一种看法 :“ 既然俄国是战争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那么她就应该被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 ,同时必须竭尽全力与她建立友好关系。”为美国代表团充当翻译的“奇普”·波伦后来说 ,在德黑兰会议上 ,霍普金斯对总统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

丘吉尔后来称 ,正是在德黑兰会议上 ,他第一次意识到了英国是多么小的一个国家 :

我的一旁坐着已经伸出了爪子的俄罗斯熊 ,另一边是庞大的美国野牛 ,在它们中间则是可怜的英国小驴……

尽管战争期间英美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 ,而且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关系也很友好 ,在德黑兰会议上 ,罗斯福的首要目标仍然是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罗斯福对他的老朋友 ,劳工部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说 :

克格勃绝密档案

温斯顿变得面红耳赤、满脸怒容，而且他越是这副表情，斯大林就越会露出微笑。最后，斯大林终于忍不住发自内心地大笑起来。在这三天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曙光。我一直不动声色，直到斯大林和我一起笑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我叫了他一声“乔大叔”。昨天，他可为我过于冒失，但是那一天他笑了，还走过来和我握了握手。

自那开始，我们之间建立了私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一样开诚布公地交谈了。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霍普金斯私下到英国大使馆去找丘吉尔并告诉他，斯大林和罗斯福都坚决要求在明年春天展开“霸王行动”——即英美联合跨海峡进攻被占领的法国，因此英国必须停止反对这个计划。丘吉尔适时地做出了让步。对斯大林做出的最重要的政治让步是英国和美国同意苏联在战后恢复它 1941 年时的边界。这意味着苏联能够收回在苏德条约中失去的土地，包括：波兰东部、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国家以及摩尔多瓦。这种安排并没有征求当时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意见。

斯大林兴高采烈地回到了莫斯科。美国 and 英国似乎已经认可了——用俄国的一位外交家私下的话说——俄罗斯“在邻国建立友好政府的权力”。罗斯福之所以在德黑兰会议上愿意如此满足斯大林的要求，是因为他认为在二战中是苏联红军承受了半数以上德军的疯狂进攻，因此西方在军事上欠了苏联一笔债。但是，另一方面，斯大林在谈判中取得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非常清楚罗斯福手中的底牌。

尽管公开和秘密情报站在向罗斯福政府进行渗透这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它们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却完全失败了。中

克格勃绝密档案

心最初交待给扎鲁宾的任务还包括，在大量居住在美国的德国人中发展间谍，用他们来对付德国。可是到末了扎鲁宾未能发展一个德裔间谍。当中心要求他做出解释的时候，他向中心汇报说，绝大多数居住在美国的德国人都是犹太人，因此不适合承担这项任务。和扎鲁宾一样，中心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针对苏联的盟国开展情报工作上了，因此它对扎鲁宾在开展针对敌人的情报工作上的失误似乎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苏联在英国和美国的战时情报搜集工作继续发展着。1942年初，除了阿纳托利·戈尔斯基（先后使用过亨利和瓦季姆两个代号）领导的一个公开情报站之外，由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奇恰耶夫（代号约翰）负责的另一个公开情报站也在伦敦开始工作了，但戈尔斯基仍负责整个间谍网的领导工作。和戈尔斯基不一样，奇恰耶夫向英国当局通告了他在伦敦的身份，并负责与英国及其他同盟国流亡政府的情报部门的联络工作。他还领导着一个由中欧和东欧国家流亡官员组成的情报网，这些人不断向他提供英国与波兰流亡政府、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爱德华·贝内斯总统、与南斯拉夫的彼得国王及其首相伊万·苏巴什克谈判情况的情报。

与此同时，剑桥“五杰”继续提供着数量可观的情报。仅1942年一年，麦克莱恩提供的文件就装满了中心的45个档案袋。菲尔比也提供了大量高度机密的文件。1941年9月起，他被调到英国秘密情报局V科（反情报）工作。虽然这个部门当时位于圣·阿尔本，不在位于百老汇大街的秘密情报局伦敦总部里，但它的便利之处就在于它的旁边就是秘密情报局的档案室。菲尔比花了一些时间去收买和他一样喜欢红色杜松子酒的档案管理员比尔·伍德菲尔德。菲尔比后来回忆说：“这种友好